



隋唐文化研究叢書

浪漫情懷與 詩化人生

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

浪漫情懷與詩化人生是唐代文人生活中最閃光的亮點，
本書圍繞此一亮點，從讀書山林、終南捷徑、漫遊干謁、邊塞田園、
參政意識和詩化人生等方面詳加考察和論說，
著重揭示其自由心性之養育、浪漫情懷之生成、
壯大與平和之美、社會責任之擔承、
凡俗世界之超越等文化品性和審美特質，
對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作了多角度的展現。

尚永亮・李乃龍◎著



浪漫情懷與詩化人生

——
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

尚永亮
李乃龍

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浪漫情懷與詩化人生：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 /
尚永亮，李乃龍著．-- 初版．-- 臺北市：文
津，2000[民89]

面；公分．--（隋唐文化研究叢書．文
學篇）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668-595-8(平裝)

1. 中國文學 - 唐(618-907) - 評論 2. 知識
分子 - 中國 - 唐(618-907)

820.9041

89005696

· 隋唐文化研究叢書 ·

文學篇 邱鎮京主編

浪 漫 情 懷 與 詩 化 人 生

——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

尚永亮、李乃龍著

發行者：邱 家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E-mail: twenchin@ms16.hinet.net

電話：(02)23636464 傳真：(02)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文津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初版：二〇〇〇年五月一刷

印數：1000本

ISBN 957-668-595-8

定價：260元

目 錄

引 言	1
第一章 讀書山林——自由心性之養育	7
第一節 文人讀書略說	7
第二節 讀書山林之風	17
第三節 白首臥松雲	33
第四節 終南捷徑與隱士	44
第二章 漫遊與干謁——浪漫情懷之生成	67
第一節 漫遊之風的文化背景	67
第二節 漫遊的方式	70
第三節 漫遊的地域	77
第四節 漫遊中的題壁詩	96
第五節 干謁種種	101
第三章 邊塞與田園——壯大與平和之美	113
第一節 初唐從軍行	113
第二節 盛唐塞上曲	118
第三節 中唐關西吟	135
第四節 田園情趣	139
第五節 園林嗜好	150
第四章 參政意識——社會責任之擔承	157
第一節 文人與政治	157

第二節 盛世豪情	162
第三節 從浪漫到務實	168
第四節 許國忘身	178
第五章 詩化人生——凡俗世界之超越	197
第一節 詩是吾家事	197
第二節 生死文字間	218
第三節 高歌與苦吟	231
第四節 詩與親情	247
第五節 詩友佳話	254
餘 論	279
主要參考書目	283
後 記	286

引 言

唐代文人是由不同的極具個性的人構成的一個複雜群體。人的複雜在容貌，更在於心靈。正像不存在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樣，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兩個完全相同的人。而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一本書，那種忽而為玉皇大帝蓋瓦，忽而替閻王爺打井的人生固然是一部耐讀的傳奇故事，而那種沒機會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在時人和後人眼裏淡得看不出色彩的人生——同樣是一本書，雖然這書只能歸屬於風格平淡的散文一類。如此說來，要對唐代文人的精神風貌作個案的敘述，恐怕就不是一本書所可勝載。因此，本書的著眼點將主要落在唐代文人具有共性的生活層面上，並對一些突出的個體生活景觀予以片斷的展示。

唐代立國時間不算短。人們常說「有唐三百年」，這是大略而言的數字。雖然唐代自西元六一八年立國，到西元九〇七年亡國，實為二八九年；但有些唐末文人活動時間延續到唐亡之後，例如晚唐著名詩人韋莊就在故國破敗後流入前蜀為相。因而文學意義上的唐代就不止三百年。唐代時間那麼長，文人那麼多——僅據清人所編《全唐詩》統計，詩人就已達二千五百七十六人（據日本平岡武夫《唐代的詩篇》統計，神、鬼、怪類作者未記在內），這還不包括今人輯佚的有詩文傳世的作者。如此豐富的敘述對象從少年到老年，其人生軌迹自然不盡相同，但生活在同一時代，沐浴著相同的文化傳統，面臨著類似的人生選擇，就某

一時期某一群體的精神風貌而言，又有著大致相似的特點。我們認為：這種特點首先表現為衆多唐人都曾受其驅動並因之放懷高歌的浪漫情懷。

所謂「浪漫」，並不同於源於西方、作為一種創作方法的「浪漫主義」。在我國，「浪漫」一詞古已有之，如《新唐書·元結傳》：「又浪漫於人間，得非罄斲乎？」蘇軾〈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遊。」這裏的「浪漫」已有擺脫拘束、自由瀟灑的含義。與之相近或相關的，還有「浪人」、「浪士」、「浪迹」、「浪孟」、「浪莽」、「浪遊」等詞語，因了一個「浪」字，都具有真率、放縱、行迹無定、不受拘束的內蘊。近世以來，曾意譯西語 Romantic 為「浪漫的」，更增加此詞以富有詩意、充滿幻想等含義。因借此「浪漫」一詞以代表唐代文人充滿理想、高蹈不羈的自由情懷。

中國古代文人有許多別名，「書生」之外，常被人提到的還有「儒者」。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有「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云云，這話裏的「儒者」指的就是文人。書生、儒者除了給人以文雅和文弱的印象外，還常常讓人產生「白髮死章句」那種迂腐的聯想，和浪漫之類的概念似乎沒有多大關聯。事實大不然。中國是個詩的國度，唐代則是這詩國的頂峰；詩是感情的凝聚，而唐詩則是感情的高度結晶。唐代文人大都具有充沛的詩情，他們重感性發越，愛激情衝動，不僅將其一懷情懷在詩中渲瀉，更常常將之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得意時，昂首高歌，大呼猛進，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平天下者舍我其誰的無限豪氣；失意時，則憤填胸臆，抽刀斷水，吟唱著「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走向江湖，走向山林。這種情形，

在盛唐文人、尤其是盛唐文人之代表的李白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作為一個時代的縮影，這還不夠自由、不夠浪漫麼？

唐代文人的浪漫情懷有其產生的特定背景。清代詩論家趙翼有兩句常被人稱引的名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再往前追溯，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就有「詩窮而後工」的話。唐代大文豪韓愈也深有感觸地說：「愁苦之言易好，而歡愉之辭難工。」看來，詩是和不幸聯繫在一起的，換言之，痛苦是詩歌產生的溫床。應該說，這些說法都很有道理，且屢為文學史的實際所證實。不過，不幸的國運和詩家命運能產生詩歌卻難以產生浪漫情懷。在唐代，大規模的動亂確實不多，即使有也為時不長。除了使唐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和晚唐黃巢起義之外，三百年的絕大部分時光是在平和中度過的。這是浪漫情懷得以滋生的條件之一。歷史地看，一個動蕩不已、戰亂頻仍的時代會產生詩，例如漢魏之交的建安詩歌、魏晉之交的正始詩歌，但那極少浪漫可言。前者有的多為悲涼慷慨，後者有的只是壓抑、恐怖，就像阮籍在〈詠懷〉詩中說的那樣：「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這樣的心境可能有許多值得發掘的社會學和美學價值，但缺少的是浪漫。

唐代尤其是初、盛唐時期的君臣總的說來稱得上賢明，當然所謂的賢明只是在比較意義上說的——因為他們也有昏招和毒招迭出的時候，尤其到了晚年。唐太宗李世民、武則天、唐玄宗李隆基等人相繼把唐代的政治和經濟推向一個又一個高潮。史學家可以據史料指出這幾個時期的種種弊端和危機，但當時的多數唐人卻是另一副眼光。特別是到了開、天盛世，人們可能對某件具體的事和某個具體的人不滿，但一提起對社會的總評價，口氣都

是充滿了自豪感，李白的〈古風〉第四十六首有云：「一百四十年，開國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王維的〈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詩有云：「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其中流露出來的正是令人心動的豪氣和浪漫。這是建立在強大國力基礎上的樂觀心態，底氣很足，充溢著一股子有恃無恐的氣息。正因為如此，才可能出現前面提到的以李白為代表、充滿浪漫情懷的詩人群體。

唐代文化政策很是開明，對各種外來文化的態度採取來者不拒照單全收的大家態度，一點都不擔心本土文化被舶來文化所同化或吞食、腐蝕，這當然是對自己統治和本土文化有信心的表現。那時，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學自然是受重視的，以聖祖老子為教主的道教當然在尊崇之列，對西土傳來的佛教也不排斥，最多也只是讓它排在道教之後而已。武宗時的「會昌法難」是個特殊事件，不具有唐代對佛教態度的普遍意義。各種思想五音雜陳，讓唐代文人多了許多前人少有的心眼和比前人寬了許多的心胸。大概是基於對自身統治的自信，唐朝帝王不大理會詩人的牢騷和諷刺，尖銳些也無妨。武則天算是個運用特務統治出名的帝王，可陳子昂在詩裏幾乎對她的所有政策都有微辭，但陳子昂卻並沒有因此而獲罪——他後來被武三思陷害是別有隱情，沒有證據說是與詩文有關；唐玄宗向南詔開戰，死人很多，民怨很大，杜甫在〈兵車行〉詩裏說：「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憤聲如聞，可也未聽說老杜因此受了唐玄宗的什麼處分。這樣相對寬鬆的言路環境使詩人可以暢所欲言，這又是浪漫情懷得以產生、存在和不斷生長的基礎。在一個動輒得咎的

時代，膽小的文人恐怕在心中偷偷浪漫一下都不敢，更別提真的在行迹上有什麼表現了。縱使一兩個膽大的文人有冲天的豪氣，也是絕對構不成一個時代的浪漫精神的。

要是主體局囿於家或家園小天地，那是不會有什麼浪漫可言的。小天地裏即使產生得出浪漫，終究是小家子氣，很難體現出與浪漫如影隨形的豪情和大丈夫氣魄。換句話說，浪漫必得在廣闊天地裏揮灑。大天地是能使浪漫情懷有足夠空間來生發的境界，也是主體浪漫活動展開的場所。唐代文人的浪漫情懷正是在大天地中得以盡情表現的。唐代文人幸運地擁有這樣的大天地。自從魏晉以來一直分裂了數百年的版圖到唐代終於拼成了一大整塊，這就使他們避免了六朝文人的尷尬。六朝文人也想縱橫天下，浪漫一把，可惜他們想去執戈躍馬的天涯是別人的國土，只能在心裏想想而已；唐代文人卻幸運地擁有前朝文人做夢都想得到的疆域。走向遠方，走向他鄉，直到窮塞絕域，都不需要看誰的臉色，只需看一看口袋裏的東西能讓自己走多遠就夠了，有時甚至連看看口袋的必要都沒有，因為遠方有房有飯等著他們，有歡迎的目光迎接他們。那熱情的目光來自友朋，也來自陌生人。那些陌生人也許是平頭百姓，也許是朝廷命官，甚至是封疆大吏。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他們都愛詩。儘管他們不一定會做詩，但都愛吟詩是肯定的，「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這是宣宗皇帝的詩，很有權威性。因為愛詩，所以愛詩人，大家把能接待詩人當作一種榮耀，視為一種為人上檔次的標記。這樣的社會心態使詩人們放心放膽地遠遊。因為時世比較安定，因為統治者把對百姓的盤剝降到了比較低的程度，還可能因為老天作美，等等，總之唐代特別是盛唐時期的經濟比較

發達，這為詩人們的浪漫遠遊提供了物質條件。相對安定的社會也為詩人遠遊提供了人身安全的保證。詩人們主觀上要作浪漫遠遊，社會在客觀上又提供了諸多可行性，在浪漫之旅的主客觀條件都齊備的情況下，唐代文人想呆在家裏都難——這會讓鄉親父老小看的。

於是，唐代文人離開溫暖的小家，告別窗前那方窄窄的小書桌，懷裏揣著五彩繽紛的希望，背負著親人們期望的目光，走了。

走向山林，讀書去；

走向他鄉，漫遊去；

走向邊塞，從軍去；

走向京都，做官去；

走向未來……

他們為自己未來設計的是一種詩化的人生。他們不僅在詩中將實際生活詩化了、藝術化了，而且也在實際生活中追求並創造著一種充滿盎然詩意的境界。我們站在歷史的這一頭，懷著歎羨，注視著他們或匆匆或悠悠的步履，盡可能真實地來再現並評說其心性情懷和精神風貌。

第一章 讀書山林

——自由心性之養育

翻開唐代文人的生活畫卷，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便是其自由灑脫的讀書情景。與此前各代有所不同，唐人多讀書于山林寺廟之中，與青山綠水為伴，既學習知識，復陶冶性情，從而養成了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人格，展示出一種散朗脫俗的精神風貌。至於唐代不少文人熱衷的終南捷徑，一方面是與其讀書方式有一定關聯的派生物，另一方面又是借高隱以敲開官場大門的前奏曲。

第一節 文人讀書略說

正像必須是經商的人才能稱之為商人一樣，文人指的當然是讀書人，或者說是那些讀過書的人。說起讀書人，有必要先從其社會文化序列談起。

從政治角度看，封建政治建立在自然的小農經濟基礎上。農業為立國之本，而商業儘管便利民生，但它以盈利為終極目的，商人的眼光圍繞的都是一個「利」字，這有背於中國傳統理想人格中「重義輕利」的原則。同時商人流動性大，不易管理、統治。基於這些理由，傳統社會統治階層一向奉行「重農抑商」政策。順理成章的社會序列似應是農民和商人分別處於尊、卑兩極，但在被稱為「四民」的「士—農—工—商」序列中，士卻赫

然列於「農」之前。究其原因，農民和商人一樣，大都是文化的接受者，而只有文人才既是文化的接受者又是文化的創造者和傳遞者。從歷史上看，傳統文化早就把文人視為「治人」的「勞心者」，而把其他人視為「治於人」的「勞力者」。這些治人的勞心者肩負著一項極重要的使命，那便是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治國平天下，首先必須做官掌權，只有有了權位，才能施展才能和手段；然而官位有限，讀書人衆多，什麼樣的讀書人才能做官？答案非常明確——「學而優則仕」。這條在幾千年前就由讀書人的祖師孔老夫子規定好了的原則，成為中國人歆羨「書香門第」的深層心理依據。

到了唐代，隨著科舉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長足發展，讀書人更被擡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政府的官員乃至宰相，無不由讀書人擔任，其中更主要的是由科舉及第者擔任。關於科舉，唐代朝廷要求非常嚴格，《新唐書·選舉志》云：「每歲五月，頒格於州縣，選人應格。……同流者，五五為聯，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識之。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者，有罰。」其所以如此嚴格，就是防止工、商等異類之子冒名頂替，步入仕途。《大唐六典》卷二吏部類明載：「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皆不得入仕。」不僅不得入仕，而且連士人行列也進不去。同書卷三戶部類說：「辨天下之四人，使各專其業。……工作貿易者為工，屠沽興販者為商。……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士。」不能參加科舉，不能入仕，甚至連士人的邊都挨不上，可見唐代工、商等類人社會地位之低下（儘管在經濟上很富足），更可見出唐代讀書人、尤其是由讀書而科舉而為官者身份之尊崇。

既然讀書人面前擺著一條可以飛黃騰達的大道，普通人家的家長自然無不「望子成龍」，落實到行動上，便是課子讀書，勤加督責，勸其懸梁刺股，不敢稍有懈怠。中唐文學家韓愈有一首題爲〈符讀書城南〉的詩，其中說：

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疏。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壁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系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

韓愈把一個人腹中有無詩書提到人能否爲人的高度，一語道盡了中國人重視讀書的心態。在這段話裏，韓愈對本詩的特定讀者「符」諄諄教誨。先是給符以鼓勵：沒有人是生而知書的天才（這是一句對智商不高的孩子最爲靈驗的安慰話——而中國古代文人的後代多是酒後的結晶，智力常成問題），一個「勤」字是獵取書本知識的必由路徑——用今人的話說就是「書山有路勤爲徑，學海無涯苦作舟」。肚子裏不裝詩書只裝飯，那只能叫飯桶。接著啓發：人在孩提時代，本無聰明與愚昧之分，到弱冠時期，就開始有了高下；到而立之年，少年玩伴有的成了飛天的龍——成爲衆人仰慕、家人自豪的公卿，有的淪爲滾地的豬——

成為被人呼使、自身受罪的馬前卒，這都是因了少年時的苦學與不學之別，和出身並無干係。例子是公卿常出身微賤，而三公之後人常淪落到饑寒交迫的境地。從韓愈的詩中不難明白，他的讀書觀並不以純粹的提高個人素養為旨歸，而是以進入仕途享受富貴為終極目的。這樣的讀書觀當然透著俗氣，但卻十分實在，因為道理很簡單，還是那五個字——「學而優則仕」，只不過韓愈將這一原則作了一次詩化轉述而已。詩題裏的「符」指韓符，韓愈的兒子。「城南」是詩人在長安城南的別墅。換句話說，作為一首在家中寫給兒子的詩，其讀者對象和創作環境都自然不過地暗示著他所說的是心裏話，因而也就具有了我們瞭解唐代文人所不可缺少的心理學價值。

唐人普遍重視讀書，這從他們的自我陳述中即可看出。

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有〈上瑕丘韋明府啓〉云：「幸以奉訓趨庭，束情田於理窟；從師負笈，私默識于書林。至於九流百氏，頗探其異端；萬卷五車，亦研其奧旨。」又有一篇〈上兗州刺史啓〉自稱他「頗遊簡素，少閱縑緗。每蟋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碧蒲于翰池。」這兩封信是分別寫給州縣長官看的，目的在於獲得對方的舉薦，因而自然要說到自己的讀書問題。駱賓王的話說得很雅——州縣長官都是水平不低的文士，把話說俗了就不會引起注意甚至會引起蔑視，所以很淺易的意思要用盡可能艱深的詞語表達出來。這兩封信用詞不同，但內容類似，意思是我從小讀了很多書，讀得非常認真，讀得十分自覺，讀得極其刻苦，識透了書中藏得很深的奧妙。兗州的轄地即今山東曲阜。一個外鄉人（駱賓王是婺州——今浙江義烏人）敢對文化之鄉的父母官誇下海口，其膽量不是包天也得有斗大！從寫信

人的初衷來看，作者是要強調自己的肚子裏裝了很多墨水，才略足堪經時濟世。推薦像自己這樣學富五車的人才只會讓世人傳誦長官慧眼識賢良而絕不會丟臉。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雖然駱賓王說的是自身經歷，但著實反映了唐代士人自幼好學苦學的一般情況。

從小養成的興趣，往往至老不衰。晚唐詩人皮日休的〈讀書〉詩說：「家資是何物？積帙列梁梠。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儔侶。」儒家把人從道德角度分為小人、君子 and 聖人三個等級。孔子淳淳教導弟子要做的是君子。至於聖人，孔子承認那只能是心儀的目標，連他自己也不能達到。而讀聖人遺教聖訓，就能與那些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哲人進行心靈交流，仿佛是他們的私淑弟子。這是一種任何物質享受都不能給人的精神滿足。所以皮日休把書籍當作家產加以珍惜。

唐代士子讀書也以功名為目的，這與前代士子並無二致。在功名未就之前自然要讀書，即使有了功名後，書仍然是要讀的，只是目的略有不同罷了。如李白詩名滿天下後待詔翰林時就還在讀書，有詩云：「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心，掩卷忽自笑。」尤其是後兩句，真是讀書人心中皆有而筆下都無的妙語，把古往今來讀書人在書中找到前代知音時的快意和得意準確地表述出來了。詩的題目就叫〈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想來，李白所「言」之「懷」當是集賢殿諸學士共同的讀書感受吧。

說起唐代士人的讀書，應提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書在哪裏讀？

一般說來，唐人第一個讀書地點在家中，這主要是在他們的

幼年時期。在家讀書，即要求家中須有讀書的條件，這對那些出身書香門第的子弟來說，應是不成問題的。武則天時官至宰相的狄仁傑是個例子。《舊唐書·狄仁傑傳》載：「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仁傑讀書家中，而能力排干擾，其專心致志的情形令人佩服。

當然也有不少人家經濟上並不富裕，但卻很捨得在家庭文化建設上投資，大量購置書籍。這既是爲自己的人格理想和出路投資，也是對孩子的未來投資，爲消解自己心中的擔憂投資。《舊唐書》卷一六五記柳公綽「家甚貧，有書千卷。」典型的是河南人杜兼常，他把並不豐裕的俸祿大部分用以書籍的購置，《南部新書》辛卷說他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有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對那些從嘴裏省下的書籍，杜兼常視之如命，說兒孫若有人把書賣掉，那就是「不孝」，而且就連把書借給別人也與賣書同罪。這三句話二十一個字一筆一劃寫一萬遍，即使打些折扣，字數也相當驚人了。由此足見他對詩書傳家的重視程度。杜氏能對買來的書籍進行校勘，則其本身文化水平之高不言而喻。藏書與杜兼常一樣多並對藏書自行校讎的還有韋處厚，《舊唐書》本傳說他「聚書萬卷，多手自刊校。」蘇弁的藏書就更驚人，《舊唐書》本傳說他「聚書兩萬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秘閣焉。」藏書數量竟可以與皇家圖書館媲美，這在那個時代實在不是一件小事。柳仲郢對書的嗜愛比乃父柳公綽有過之而無不及，《新唐書》卷一六三說他家有萬卷藏書，每本藏書都有三種藏本：一本收在書